

#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逻辑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2401)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也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且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应用于经济工作中形成的、以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为核心的科学思想方法的应用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对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迭代上升、生产关系的优化和上层建筑的建设等多个层面的探索结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立更加完善、更加定型的制度安排的实践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摆脱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对立,作出了超越性的文明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文明道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唯物史观;第二个结合;科学思想方法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24)05-0021-13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405021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崭新理论命题,这种文明形态不仅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且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形态,是在借鉴资本文明等一切人类文明基础上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标识性的“术语”,是习近平<sup>[1]</sup>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直接将“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sup>[12]</sup>

###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运行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社会的规律性和历史趋势,勾画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形态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过程,<sup>[13]</sup>阐述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建立了指导社会运行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方法,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两大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指导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两大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对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指导性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体系。

#### (一)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生产方式<sup>①</sup>变革下的人类社会不断由新的社会形态替代旧的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文明形态发展为高级文明形态、由旧文明形态发展为新文明形态。除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的愚昧和野蛮为主要特征的原始社会外,依次更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明”形态,是因为它已经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一阶段,进入了“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尽管这种文明形态存在着“野蛮”“掠夺”,但由于“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14]</sup>,因而,它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比,是更现代、更文明的社会形态。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是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力量;生产关系是第二位的,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亦即“生产的社会形式”还处于量变积累未引起质变的情况下,生产力是作为“劳动的方式”的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条件<sup>②</sup>,例如,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机器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资本雇佣关系。从生产方式两种含义及其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生产方式中介,亦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产生和变革的基础,生产关系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即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但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函数,甚至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滞后变量而不是相反,生产方式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安排,又要发挥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sup>[15]</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在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成了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关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

<sup>①</sup> 生产方式的含义有两重性,包括劳动的方式和生产的社会形式。劳动的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结合的方式以及他们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我们熟知的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就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可以用社会经济结构或社会形态来描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参见: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sup>②</sup> 早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讲过:“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77-478页)

泽东<sup>[6]</sup>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应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应是完全适应于生产力的，即便是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认“完全适合”的前提之下。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起作用。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sup>[7]</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和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在生产方式上，突破了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形式上，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公式，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在分配关系上，突破了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的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对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判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制度优势，根据生产力所处的阶段选择生产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并理顺生产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 （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sup>①</sup>。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制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且贯穿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sup>[8]</sup>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集中体现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在不同的时期都提出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等相关论述。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国家是政治的权力机关，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等强制性手段与运用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影响经济生活。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定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克服“市场失灵”，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砥砺前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强大建设功能的主体，而这些作用都是建立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因此要理解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需要充分理解国家的作用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关系，习近平<sup>[9]</sup>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乃至起到决

<sup>①</sup>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些苏联文献中，使用的不是“经济基础”，而是更贴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现实基础”。

定性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为理解为什么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什么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提供了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系列论述,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力指导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和发展。

### (三)科学的思想方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的根本方法,实践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实践认识论应用于经济工作之中,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等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遵循。

1. 坚持系统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战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sup>[10]</sup>。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大原则之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sup>[11]</sup>

2.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常说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具体实际”就是现实中的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列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sup>[12]</sup>

3.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的工作方法,是实践认识论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稳”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调和全局,只有把握了这个前提,才能守住资源、环境和生态底线,守住民生的底线,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经济才能平稳发展。在“稳”的基础上,要在关键领域“进”,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进展。习近平<sup>[12]</sup>总书记强调:“‘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

### (四)第二个结合与人类文明进步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对于一个空间维度上具体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sup>[14]470-471</sup>

“文明”与“文化”相通,但内涵更丰富,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概念,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积极成果的整体性概括和正面性评价。<sup>[13]</sup>文化是文明的底色。就西方现代化而言,尽管从时间维度上都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但在空间维度上具体到某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文化的烙印。就拿世界上第一个“原生性”的现代化国家——英国来说,它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率先实现工业化、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并通过野蛮“掠夺”将资本主义文明向世界各地传播,成为“日不落帝国”,其原因除了盎格鲁—撒克逊本身的文化特征外,或许与它通过大宪章运动建立议会、通过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

文化历史传统有关,至少与通过贩卖黑奴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领导下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历史有关。<sup>[14]</sup>就现代化而言,通过选择与本国文化特征相结合的路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踏上现代化的快速列车。遗憾的是,许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西亚的国家,却选择了与自身文化背道而驰的西方现代化路径,结果大都失败了。1960年世界上已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了2008年只有13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近50年没有迈入高收入经济体之列,绝大多数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sup>[15]</sup>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它有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耦合的文化基因。对于这种文明的特殊性,习近平<sup>[16]</sup>总书记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它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特性,并特别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为我国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打牢了文化根基,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彰显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华文明底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觉推动文明传承与创新、交融与互鉴的历史担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 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探索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下围绕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迭代过程、生产关系的优化和上层建筑的建设等层面,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探索历程为主线,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孕育过程进行研究。

### (一)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工业建设的探索

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洋枪洋炮将沉睡的东方巨人惊醒,原来处于传统国家和农业文明体系下的中国,在面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的英国的挑战时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于是进步者开始寻求治国良方,虽然“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sup>[17]1469</sup>,但是“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sup>[17]1471</sup>,即便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因为“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而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在寻求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探索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17]1471</sup>,“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sup>[17]1471-1472</sup>,选择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和通向“大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最优选择,于是毛泽东<sup>[17]1471</sup>同志不无感叹地讲道:“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我国要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问题,并提出了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极富创造性的构想。毛泽东<sup>[17]1081</sup>同志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在工业基础条件极其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进行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设,成立了大量国营工厂(后期一般称为国营工厂),如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中央兵

工厂、中央印刷厂,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难民纺织厂、制鞋厂。其生产方式基本是工场手工业方式,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军事供给制,分配一开始采取供给制,后期有的采取工资制。广大人民群众在极大的革命热情中工作,生产力快速发展,基本实现了军需物资和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初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工业经济体系。<sup>[18-19]</sup>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还建立了与生产和交换条件相适应的对外贸易体系,提出了具有当代价值的“对外调剂,对内自由”贸易方针,<sup>[20]</sup>而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业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推动了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为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国落叶扎根奠定了基础。

## (二)社会主义文明的探索和国家工业化的推进

尽管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就踏上了探索工业化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进行了工业化建设,但由于战争等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1952年我国工业产值才是1933年的17%<sup>[21]</sup>。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对国防现代化的需要等原因,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战略的工业化发展道路<sup>①</sup>。在苏联156项工程援助和5092个专家的帮助下,<sup>[22]</sup>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在我国开始生根发芽,我国工业取得飞跃式发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53年我国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通过“一化三改”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比预期的时间要短很多。从此,中国式现代化就深深烙上了社会主义的痕迹,中国式现代化建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一定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并在苏联帮助下,于1954年12月基本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既然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模式,那么还需要市场进行商品生产吗?毛泽东<sup>[23]</sup>同志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就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进行了区别,突破了恩格斯公式<sup>②</sup>和斯大林对恩格斯公式解释的限制,破解了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利用商品生产的历史性难题。遗憾的是,理论上的突破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上就能顺理成章,商品生产在我国几乎没有建立起来,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已经被扼杀了。<sup>[24]</sup>

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只能是作为政府部门延伸的国营工厂,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便于统筹安排、支援工业建设的组织形式,这是因为中国作为赶超型国家很难通过自发的市场经济来完成工业化建设。从实施效果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集中力量进行了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sup>[25]</sup>虽然后来我国被迫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从总体看,依然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道路。这一点也并不因为国营工厂的管理模式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苏联的厂长负责制(又称“一长制”)而改变,也没有因为工资形式的差别而改变<sup>[26]</sup>。通过这种模式,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1977年工业总产值已达3728亿元,1978年达到1952年的12.3倍,<sup>[27]</sup>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化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sup>①</sup> 事实上,早在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sup>②</sup>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生产随即消失。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超过了曾经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印度和巴西等,而且在一些指标上已接近或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sup>[24]</sup>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有了长足进步,如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功,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入列,等等。

当然,国家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并不只是一串数字组成的发展指标,更寄托了民众对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物质丰盈、文明进步的愿景。在这一时期,“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几乎不存在<sup>①</sup>,“人的异化”几乎完全被消除,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工人的建设热情、社会主义热情洋溢的劳动竞赛及社会主义工厂呈现的人与机器融于一体的“沸腾感”,<sup>[21]</sup>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缩影。但管理的可持续性、分配制度的“大锅饭”和只有精神激励缺乏物质激励的问题,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许多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体制机制僵化等,给这种发展模式蒙上阴影。在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同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逐渐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打破这种体制机制僵化模式已成为必然。

###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跨越发展

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科学判断中国的历史方位,是新的历史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上取得突破进展,社会主义文明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但是,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状态。1978年我国的经济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1%,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大批返城的知识青年找不到工作,大量群众还吃不饱饭,我们还处于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之中。<sup>[25]</sup>这是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偏差所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人类社会形态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我们的历史方位,即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的任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突破了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28][373]</sup>社会主义本质论还突破了搞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sup>[28][116]</sup>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就“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走出了一条把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道路”<sup>[29]</sup>。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强的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贯彻“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增长的奇迹,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使“中国富了起来”<sup>②</sup>。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经济发展的环

① 国营工厂中不存在与资本主义文明对应的“资本”概念。

② 这里的增长速度指的是1978—2002年的增长速度。

境和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

新的历史时期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教条,从改革开放初逐渐在计划经济中注入市场因素,到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完善,充分利用资本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文明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实现,“以农补工”的需求减弱,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新环境下出现<sup>①</sup>,而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孪生的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生产方式冲破了旧的经营管理体制束缚,解放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国营企业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独立的现代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1978—1992年的“放权让利”时期、1993—2002年的“制度创新”时期、2003—2012年的“国资管理”时期三个阶段。<sup>[30]</sup>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因所有权缺位,又肩负政策使命,其发展前景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亏损时更加明显。但在改革的推动下,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其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提高。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同比增长5.8%;全国国企资产总额为1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全国国企营业总收入为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0.8%。新中国成立后初步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的历史时期实施对外经济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安全保障。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对外经济开放大幕的开启(1978—1984年)、对外经济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1984—1992年)、全方位对外经济开放格局的形成(1992—2001年)、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2001—2012年)四个历史阶段。对外开放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总体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基础。

### 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与西方现代化文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明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sup>[31]</sup>

#### (一)新发展理念引领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

随着人口红利消失、要素价格上涨、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等情况的出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引我国经济的发展,其原因为:第一,需要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来抵消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压力,这个动力的唯一选项

<sup>①</sup> 到1983年底,我国99.5%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数目高达586.3万个,其中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7.8%。(参见:王瑶、郭冠清、黄志刚:《新中国70年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就是创新,这正是“创新发展”置于新发展理念首位的原因。另外,虽然在经济新常态下,国际贸易占比在持续下降,但依然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开放发展”不可缺少。第二,要破解我国结构失衡问题,亦即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缩小,需要“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第三,要破解高污染、高能耗发展不可持续问题,需要“绿色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sup>[15]</sup>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在于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11]</sup>新发展理念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遵循。创新发展理念破解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和新时代人口红利消失的难题,找到了转变生产方式、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共享发展理念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尽管西方现代化走到了前边,但那是“资本”的现代化,是文明与野蛮并存的现代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的基础上奔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而奋斗的现代化。习近平<sup>[32]</sup>总书记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协调发展理念是摆脱“物的依赖性”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习近平<sup>[32]</sup>总书记指出:“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诉求,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是一个生产目的问题,也是一个满足消费需求、增加市场容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到2035年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将更加显现,绿色生活方式将广泛形成。开放发展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倡议下的发展理念,是解决高质量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而是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产方式调整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不仅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减速,而且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需求侧管理政策作用明显减弱。财政政策的刺激不仅难以发挥“乘数效应”,而且由于投资机会减少,还有可能对私人投资产生部分“挤占效应”。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市场由过剩转向短缺,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出现,工资的快速上升也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出现好转,即出现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生产方式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转变。在这个阶段,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消失,“雁行理论”失效,迫切要求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要素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消费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消费已经连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生产消费趋向升级。第四,“供需错位”严重。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第五,经济结构失衡。1991—200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从次级不平衡状态转向次级平衡状态,而在2000—2011年则从次级平衡状态转向次级不平衡状态,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比较严

重。<sup>①</sup>

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问题,实质则是结构问题,需要对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在内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式已基本适应生产力状况,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已基本理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最明显的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来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sup>[33]</sup>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正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根据所处的生产力阶段和传统文化,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课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表明,虽然市场经济存在种种缺陷,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不过,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中国经济发展也很难创造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仍然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关键一条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置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更高层次上。

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看,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人均经济总量并不高,同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突破,意味着市场在所有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经济循环各个环节的商品价格都拥有决定性影响,也意味着政府要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后对市场作用的一次全新表述,也是我国从对市场经过“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之后,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全新把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突破。通过健全反垄断政策、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工商登记便利化、完善市场定价制度等,我国正在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

<sup>①</sup> 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1年的0.5644下降到2000年的0.4513,之后提高到2011年的0.6173。

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底,全国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54亿户,个体工商户达1.03亿户<sup>①</sup>,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 (四)经济治理现代化和更加完善更加定型的制度安排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制度,也离不开治理。只有把制度与治理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sup>[34]</sup>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sup>[35]</sup>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sup>[36]</sup>

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色。例如,经过近30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此为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经济领域,我国逐渐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治理保障体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经济治理体系、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央地经济治理体系、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加强统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并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家治理效能的大幅度提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摆脱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对立,作出了超越性的文明贡献。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强东弱”的格局,瓦解了“西方中心论”的夜郎自大,使西方不得不跳出“西方”,站在“西方”之外看世界,不得不感受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威力。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世界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寻求自身的发展,是对狭隘的“文明冲突论”的超越。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不同于西方的更新更高的现代文明的出现,宣告了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第四,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利用资本文明发展生产力,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生产目的,从而能很好地驾驭资本,使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根本上摆脱了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和野蛮,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的全面发展将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西方文明形态的最具震撼力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历史性贡献。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始终传承不衰、历久弥新,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面临巨大危机,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落伍了。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了从“站

<sup>①</sup>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55页。

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对社会主义文明作出历史性贡献。我国在新中国成立短短的三十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为人类所共识,社会主义文明事业将更加绚丽多彩。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成为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迈进、形成崭新的文明成果提供了路径选择,使更多人类智慧的结晶以多元化的载体和形式呈现给世界,这对推动人类社会持续进步、文明的融合、文明的多样性创造了条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和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为人类的社会文明与制度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 [2]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3-02-07].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07/content\_5740520.htm?eqid=8e3b48b00001dcbc000000036475baa4.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郭冠清.回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再解读[J].当代经济研究,2020(3):5-13.
-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 [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1.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5.
- [9]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 [10]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164.
- [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12]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9.
- [13]刘建军.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23(3):60-74.
- [14]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 [15]郭冠清.新发展理念生成逻辑及其对新发展格局的引领作用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4):19-25.
- [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汪海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营工业[J].江西社会科学,1985(6):38-42.
- [19]彤新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探索与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J].经济纵横,2021(6):14-20.
- [20]张瑞,郭冠清.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百年探索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2021(9):5-17.
- [21]彭圣钦,周晓虹.现代性的再启与“工业中国”的想象——以20世纪50年代草明的工业小说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28-137.
- [22]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4.
- [2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9.
- [24]王瑶,郭冠清,黄志刚.新中国70年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J].上海经济研究,2019(12):14-24.
- [25]陈文福.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探索[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1):112-115.
- [26]林盼,朱妍.工人分化与激励异化:20世纪50年代国营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J].史林,2015(3):160-169.
- [27]王立胜,赵学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70年全景实录:上卷[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9:616.
-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9]韩庆祥.论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2):5-20.
- [30]黄群慧.“新国企”是怎样炼成的[C]\蔡昉,等著.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05-224.
- [31]郭冠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探索与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J].经济纵横,2021(6):36-43.
- [32]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求是,2019(10).
-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34.
- [3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 [3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
- [3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责任编辑:张佳睿)

## Logic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GUO Guan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1)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constantly combin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ies and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hundred years of practice,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a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future social civilization envisaged by classical Marxism. This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socialist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between the socialist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It is the application result of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 formed by the CPC through creatively applying Marxist dialectics and practical epistemology in economic work, with the problem-oriented and system concept as the core.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CPC's exploration on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iterat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ptimizing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building the superstructure around the theme of modernization for a hundred years. Thi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roken the Western centrism,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end of history. Rising abov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man, and man and himself, thi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makes transcendental contributions to civilization, paving a new way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